

一座祠堂，见证长征决策和出发

苏春生 杨媛



梁氏祠堂

损等病害，有效修复建筑本体损伤。经过持续修缮养护，旧址整体结构稳固、格局完整、风貌如初，本体保存完好。

网格管护，全域守护长征旧址。针对偏远乡村长征文物旧址管护难点，建立科学化、网格化、常态化管护模式。将马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等长征文物旧址纳入全域文物网格化管理体系，实行片区包干、专人负责，落实日常巡查、定点值守、动态监测制度，实现管护无死角、无空档。建立“日常巡查+专项督查”双重管控机制，常态化排查消防、结构、安全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逐项销号整改。全面落实市、乡、村三级革命文物守护人制度，挂牌公示管护责任、岗位职责，层层压实管护任务，有效破解偏远零散旧址监管薄弱难题，织密织牢了全域长征文物旧址的安全防护网。

精细呵护，定期检修保养。针对马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等土木建筑易受潮、易虫蛀、易腐朽的短板，该市坚持预防性保护与常态化养护并重，定期开展白蚁监测消杀、通风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从瑞金沙洲坝搬迁到云石山乡。当时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各中央机关分散在云石山乡的各个村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扎在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中革军委驻扎在梅岗，中央政府则驻扎在云山古寺中。

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中共中央讨论、决定、颁发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命令，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难决策、秘密部署、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随即，在这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转移，由此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因此，丰垅村被誉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村”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策源地”。

匠心修缮，留住长征历史记忆。马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原为清代光绪年间客家梁氏祠堂，土木结构传统民居建筑，整体格局完整、风貌古朴。近年来，瑞金坚持精细化保护、常态化管护、内涵化利用，深挖旧址承载的长征历史记忆，切实让长征文物旧址焕发时代光彩。

为完整保存长征历史实物载体，瑞金持续加大旧址保护修缮力度，积极争取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资金，对旧址开展系统性、规范性修缮整治，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历史肌理与原貌风貌。针对土木结构建筑易损特性，2018年至2025年，多次对旧址木质构件开展局部维修，精准治理构件老化、松动、破

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保护修缮路径与经验

毛有为



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

遗址价值与险情背景

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位于山西省定襄县西河头村，是与河北冉庄、北京焦庄户齐名的全国三大地道战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定襄军民依托地道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次，歼敌1000余人，成功地创造了自武器落后、以少胜多打击敌人的典型战例，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体现。

1964年，为接待外宾参观，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修缮后对外开放。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红色景点之一，该遗址探索出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充分彰显了“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的教育阵地作用。

历经数十年自然侵蚀与环境变化，至2020年，遗址本体病害集中显现，文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自然环境层面，雨水持续下渗造成地道内部普遍渗水，植物根系不断侵入墙体缝隙，砖墙体出现严重酥碱、开裂、鼓包、部分区段发生坍塌，墙皮大面积脱落；原开放段地道总长约2000米，受积水、淤泥堆积影响，仅南干线及中干线局部600米至700米地道可以通行。遗址内部水井井口封口石断裂，井内通风不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取水轱辘等原有构件缺失；地道喂马槽入口损毁缺失。与此同时，人为扰动因素进一步加剧遗址损毁，伴随新农村建设推进，遗址上方地表铺设大量水网、电网管线，管线存在跑冒滴漏风险，持续改变局部区域水文条件，进一步加剧地道渗水问题。多重风险叠加之下，遗址已经不具备安全开放条件，实施系统性、抢救性修缮迫在眉睫。

抢救性修缮工程全流程

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保护维修工程严格执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管理制度，落实险情研判、项目申报、方案编制申报、财政评审、专项资金下达、工程招标施工、过程管控、四方初验、市级验收整改、市级复验、省级终验完整工作链条，项目全周期留存档案资料，实现项目全过程可追溯。

面对遗址紧迫的安全隐患，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牵头组织相关技术单位编制《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保护修缮项目计划申报书》，按照县、市、省级逐级审核上报至国家文物局。2020年11月11日，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同意选取部分区段实施一期保护性试点工程，通过试点积累可推广复制的地下遗址保护经验；要求项目单位深化勘察研究，统筹编制遗址整体保护展示方案，分阶段分步推进项目实施，同步强化遗址日常养护，及时处置各类常态化病害。

获得立项批复之后，项目单位按照批复要求委托专业设计单位编制《西河头地道战遗址保护维修设计方案》，并再次逐级审核上报。2021年11月19日山西省文物局出具审批函，2024年国家文物局正式下达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为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基础。

2024年6月完成工程招标工作，履行开工备案手续，同年8月16日组织召开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会议，工程正式开工。施工全过程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不改

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原则。项目经科学确定修缮技术路径，考虑地道内部空间狭窄、通风差，施工以人工作业模式为主，规避大型机械进场扰动土体与文物本体。核心施工内容包括地道分段人工清淤与排水防渗处理，针对墙体坍塌、裂缝、酥碱等不同残损情况，分级开展剔补、斩砌、补砌、拱券重砌；采用逐米推进工艺处理下翻口渗水病害；精细化掏挖原址地道与马棚、井亭、石碾等地面隐蔽出入口；增设排风设备优化地下空间微环境；内墙抹灰严格遵循原形制、原工艺，拒绝现代化装饰，最大限度保留革命遗存历史面貌。

实体工程完工之后，项目执行多轮次、闭环式质量核验流程。首先开展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四方初验，对工程实体质量、资料完整性开展内部核查。初验完成后于2025年5月13日向忻州市文物局提交验收申请。2025年6月25日忻州市文物局组织开展首次市级验收，专家组提出明确整改意见。施工单位按照专家组意见逐项落实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申报市级验收。2026年3月24日忻州市文物局组织复验，完成整改后通过市级层面初验。2026年7月21日项目单位正式向山西省文物局提交竣工验收申请，2026年8月26日，工程顺利通过山西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终验。

地下文物工程区别于普通建设工程，本次验收体现“验收—反馈—整改—复核”闭环管理特征，专家组除实体工程质量核查之外，同时针对遗址后期水文监测、日常养护、风险防控提出指导性意见，将保护工作视角延伸至工程竣工之后的运维阶段。

工程实践取得的主要经验

项目管理层面：试点先行、分步实施，降低地下遗址施工风险。国家文物局批复确定一期保护性试点工程的实施思路，不追求一次性对全长约5公里地道实施全域修缮，是适配地下地道遗址特征的科学决策。地下地理埋藏于土体内部，水文、土体结构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前期勘察难以完全预判施工扰动带来的次生风险。选取代表性开放区段开展试点修缮，可以实地检验清淤、排水防渗、砌体修复、隐蔽接口复原等成套工艺的实际成效，在实践当中积累地下密闭空间施工组织、安全防护、病害处置经验，为后续编制遗址整体保护展示方案提供现实依据。该模式有效规避盲目大规模施工可能带来的墙体坍塌、土体失稳等文物损伤风险，对于病害复杂、体量较大的地下革命文物项目，具备重要借鉴意义。

技术工艺层面：坚持病害分级处置，牢牢守住最小干预底线。地道砖砌体病害类型复

除湿、病害排查治理，持续延缓建筑构件自然老化损毁。同时配齐标准化消防设施，定期检修更新、维护保养，从源头防范化解文物安全风险，以精细化科学管护守护长征珍贵遗存。

活化展陈，讲好长征故事。深挖马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的独特历史价值，通过原状复原陈列、专题辅助陈列等，复原了长征前夕的工作生活氛围，再现了红军长征艰难决策、秘密部署、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等峥嵘历程。以实物、实景、史实讲好长征故事，让文物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可传承的红色记忆。

在马道口中共中央旧址专题辅助陈列中可以看到：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作出了战略转移的艰难抉择；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入第一野战纵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也随纵队行动。

90多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如今，这座古老祠堂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溯源长征、致敬长征的重要参观研学点，因为它见证了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的关键决策，标记着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起点。

（作者单位：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天龙山石窟是北朝至隋唐北方石窟艺术体系演进的关键节点，具有重要的艺术史与文物史价值，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依托系统性数字复原成果打造的“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自2019年起先后赴法国、希腊、埃及等国巡展，实现了流失石窟文物价值的跨国重塑与文化传播。该展览入选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推广项目、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信息化发展典型案例”、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同时获评国家文物局石窟寺类流失文物数字复原示范项目，成为我国石窟文物数字化对外传播的代表性成果。

展示逻辑与虚拟合体复原

相较于传统文博数字化展览的影像化呈现模式，“美成天龙”专题展构建了“空间复位—场景重构—语境还原”的展示逻辑，依托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还原造像被盗凿前的洞窟原生空间秩序，重塑造像体量、方位、视线、组合关系的完整仪式场景。这一模式有效破解了海外流失造像长期碎片化、孤立化的展陈困境，使脱离原生建筑与信仰语境的离散文物在数字空间中实现场景归位，也是国际学界首次大规模完成海外流失石窟造像与原生洞窟的虚拟合体复原实践。

2021年，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从日本顺利返回原址，成为近百年来首件成功回流的天龙山石窟本体造像，标志着流失石窟文物追索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实体文物的物理归位与数字化成果的虚拟复原形成虚实互证、双向赋能的良性格局。2022年天龙山石窟数字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整合裸眼3D、沉浸式多媒体等多元技术手段，构建“数字全景复原+实体文物实证”的双重阐释体系，既弥补了石窟原址残缺失序的视觉与文化缺憾，也为公众提供了兼具科学性、观赏性的文物认知渠道。

基于数据采集、学术考证、国际传播、文物追索与实体展示的系统性联动，构建起一套可复制的石窟流失文物数字化治理闭环。跨国协作形成的学术网络与机构资源，为项目长效推进提供了制度支撑。数字化成果不仅厘清了流失造像的原生区位信息，完善了文物价值阐释体系，还建立了标准化的流失文物身份核验、原位比对与权属考证体系，为后续文物追索提供关键学术支撑。

价值溯源与历史反思

天龙山核心区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及千余组浮雕、藻井遗存，另存明代千佛洞窟4座。石窟营建跨越东魏、北齐、隋、唐四朝，历时近四百年。其中隋唐造像工艺成熟、形制完备，以圆雕为主体，造像气韵温润、纹饰凝练、比例和谐，融汇域外佛教艺术与中华本土审美，形成特征鲜明的“天龙山样式”，在北朝古朴范式向隋唐成熟造像体系的过渡中承担承前启后的艺术功能。

1908年以来多国学者陆续开展石窟调查，日本学者关野贞依托地方志线索确认石窟遗存，并在《国华》杂志刊发研究成果，首次将天龙山造像的艺术价值纳入国际学术视野。社会关注度的提升，间接诱发了文物盗凿行为。1923年起，日本山中商会对天龙山石窟实施规模化、产业化盗凿，大量洞窟佛首被凿取，完整造像被切割拆解、非法外运。

流失造像随后分散收藏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的公共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体系，形成全球离散的留存格局。洞窟造像群是高度结构化的文化综合体，主尊、胁侍的空间配比、视线关系、组合范式共同承载特定宗教内涵与审美体系。盗凿行为导致原址残损丧失核心造型信息，海外造像脱离原生场景，造成石窟文化价值的永久性解构。

技术路径与实践逻辑

流失文物的全球离散格局，决定了实体归位短期难以实现，而数字化技术为文物“空间归位、语境复原、价值重构”提供了替代性、长效性解决方案。

天龙山石窟数字化复原具备跨学科、跨国界、长周期的典型特征。自2013年起，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率先发起系统性资料整理工作。2014年，天龙山石窟博物馆联合相关机构，在地方文物主管部门支持下全面开展原址数据采集、海外数据对接与数字复原研究，构

文物复位与价值重构

王金花

展示逻辑与虚拟合体复原

天龙山石窟数字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标准化的石窟数字化方法论体系，构建起“精准采集—科学处理—严谨修复—客观呈现”的工作模式。在数据采集阶段，依据馆藏环境、保存状态、展陈条件制定差异化扫描方案，动态规避光线色差、玻璃反光、陈列角度受限等干扰因素，保障数据准确性。在数据处理阶段，通过点云去噪、纹理映射、模型轻量化实现文物形态精准还原，对残缺区域依托历史资料与对称规律开展审慎推断补全。在复位阶段，坚持技术匹配与史料考证双向互证，杜绝纯机械化模型拼接。

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清晰的数字化学术伦理与认知边界。文物数字复原并非历史原貌的绝对复刻，而是基于现存资料的最优学术还原。受老照片数量有限、视角单一、部分造像被盗前已存在残损移位等客观条件限制，数字复原天然存在信息盲区与推断成分。对此，严格区分“实测扫描数据”与“史料推断补全区域”，主动标注复原依据、数据来源与不确定区间，客观呈现当前学术认知水平，避免将研究成果绝对化为“历史原貌”。该处理方式有效平衡了展示效果与学术真实性，规避了数字化成果的过度美化与认知误导。

学术规范与边界思辨

天龙山石窟数字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标准化的石窟数字化方法论体系，构建起“精准采集—科学处理—严谨修复—客观呈现”的工作模式。在数据采集阶段，依据馆藏环境、保存状态、展陈条件制定差异化扫描方案，动态规避光线色差、玻璃反光、陈列角度受限等干扰因素，保障数据准确性。在数据处理阶段，通过点云去噪、纹理映射、模型轻量化实现文物形态精准还原，对残缺区域依托历史资料与对称规律开展审慎推断补全。在复位阶段，坚持技术匹配与史料考证双向互证，杜绝纯机械化模型拼接。

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清晰的数字化学术伦理与认知边界。文物数字复原并非历史原貌的绝对复刻，而是基于现存资料的最优学术还原。受老照片数量有限、视角单一、部分造像被盗前已存在残损移位等客观条件限制，数字复原天然存在信息盲区与推断成分。对此，严格区分“实测扫描数据”与“史料推断补全区域”，主动标注复原依据、数据来源与不确定区间，客观呈现当前学术认知水平，避免将研究成果绝对化为“历史原貌”。该处理方式有效平衡了展示效果与学术真实性，规避了数字化成果的过度美化与认知误导。

范式价值与行业启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明确要求推进石窟数字化建档、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针对国内中小石窟数字化基础薄弱、体系不完善、经验匮乏的行业现状，天龙山实践具有示范价值。

首先，数字化构建了流失文物追索的科学证据体系。积累馆藏数据、原位信息与流转资料，形成流失文物档案，为文物溯源、原位比对、身份核验提供科学支撑。其次，国际数字巡展重构了流失文物的文化叙事，在国际层面传递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立场，重塑海外馆藏文物的文化本源认知，营造良性国际舆论环境。再次，数字化是保护辅助而非替代工具。解决了文物空间失散、语境缺失、传播不足的问题。

天龙山石窟数字化复原与佛首回归实践，构建了“数字先行、虚实互补、学术赋能、传播助力、实体归位”的流失石窟文物保护新路径。在文物实体现实语境下，数字复原有效重建了流失文物与原生洞窟的空间、历史、文化关联，实现了文物的系统性修复。

实践证明，石窟数字化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视觉复刻，而在于学术建构与价值还原。坚持学术审慎、正视复原局限、公开研究边界，是数字化成果公信力的根本前提。未来，天龙山石窟将进一步深化实体保护与数字赋能的协同联动，完善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数字建设与公众教育的一体化体系，持续优化流失石窟文物数字化治理范式。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天龙山石窟博物馆）



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原展